

# 心角的暗影

唐永松

这几天我心情很不愉快,因为我的疏忽,“走失”了一名学生。

这名学生是刚转学来的,还没读上3个星期,就被她的父亲带回到原籍安徽宣城。

几天以来,我反反复复追问自己,为什么会把一个正在上课的学生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如果我当时心肠坚硬一点,后面一连串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

那天,是我上语文课。教室门口出现一男一女,他们称要找学生黄媛。家长找学生,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

开学的时候,黄媛是她母亲带来报名的,填写资料由另一位老师负责,与她相关的信息我知之甚少。

“老师,我们想见见黄媛。”

“你们是她什么人?”

“我是她姐姐,他是黄媛的父亲。”

黄媛的父亲很少说话,一副敦实又木讷的样子。

我一双怀疑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他们。

那女的见我生疑,就说:“老师,你把黄媛喊出来问问就知道了。”

迟疑了一下,我把黄媛从教室喊出来,确定他们是黄媛的父亲和姐姐后,黄媛的姐姐向我申请:“老师,今天黄媛爸爸要回安徽,很久才能再见,我们想带她出去说说话,再买点东西。”

学校留守儿童特别多,有500人左右,差不多占学生总人数的一半。这些家长为了一家人的生活,经常奔波在外。他们一走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。想到这些留守儿童与家长一别就是一年半载,分别难,相见更难;分别痛,相思更痛。我内心燃起满满的怜悯之情,不想拒绝这不算过分的请求,但考虑到是在上课期间,我又犹豫着,踌躇不定。

当时,我内心有一个疑问:难道他们昨天没有相聚在一起吃饭、说话?恰恰是这个瞬间冒起又被立即摺下的疑问没有深究下去,才有了后面的追悔。

黄媛的姐姐见我久久不表态,立即又说:“她什么也不拿,就耽搁一会儿,

一定送回来。”见我还是没有答应,她就对黄媛的父亲说:“你把户口本给老师看看。”黄媛的父亲迅速从肩膀上取下一个皮革的挎包,从里面找出户口本,然后毕恭毕敬地递到我手上。

我仔细翻看着户口本,有黄媛的名字,有她父亲的名字。

黄媛姐姐说的话入情入理,言辞诚恳,事情真实,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一段需要短暂相聚的亲情。但我没有立即答应,我需要征求和尊重黄媛的意见。当时我的想法是,只要黄媛不同意,我立即拒绝,我怕她出去后不能听我上课,耽搁学习。

黄媛学习很用心,一点就通,一学就会,每次作业书写认真,格式很合我要求,我很喜欢她。

我转身俯下身亲切地问黄媛:“你愿不愿意跟随你父亲和姐姐出去?”

黄媛很拘谨,低着头,一只手放在衣服第三颗纽扣的位置上反复捏弄着,另一只手放在第二颗纽扣的位置上反复捏弄着。仅隔了几秒钟,她微微地抬起头,清澈的双眼望向我,然后向我害羞似的点点头,她愿意跟随她父亲和姐姐出去。我同意了。

不可思议的是,当我上完课走进办公室的时候,办公室已聚集校领导 and 六七个教师,他们议论纷纷,不约而同地看着我。这时候,领导走过来问我:“唐老师,你们班刚才是不是走了一个学生?”

“是的,咋了?”

我有些紧张和慌乱,双眼盯着校领导,然后小心而又谨慎地回答校领导的问话,同时脑海里迅速冒出一个疑问——校领导咋就这么快知道我上课期间放走了学生?要知道学校明令禁止上课期间放学生出校。

“在上课期间你怎么能把学生放出去呢?”

“他说是她父亲,我没有理由拒绝。”

“你肯定是她父亲?”

“是啊,户口本都给我看了。”

“要是这个学生不回来了呢?”

“咋会?他答应我一会儿就送回来。”

我内心堆积的疑问还没有消化,霎时另一个惊悚像原子弹爆炸般——领导是怎么知道的,又是怎么掌握得如此精准?

这时其他老师说:“要是我上课,绝对不会把学生放出去!”“上课期间把学生放出去,就是老师的全责。”

我内心开始慌乱。

“你确定那人是那学生的父亲?”

“他把户口本都给我看了,户口本上有学生的名字,有她父亲的名字。”

“那位学生的父母可能是离了婚,两个家长在争抢孩子。一会儿她妈妈跑来向你要人,你咋办?”

一连串的疑问像是开了锅的水从锅底不断冒出,弄得我乱麻麻的。

就在这茫然、慌乱的时候,我努力让自己冷静,然后把黄媛的家庭关系大致梳理了一下:黄媛母亲是水富人,父亲是安徽宣城人,目前父母离婚,母亲把黄媛带到水富,父亲想把女儿带走。

我查到黄媛母亲的电话号码后立即打过去,黄媛的母亲说,她马上就到教室门口。

事情太紧急!太突然!我还来不及深思,就看到黄媛的母亲疾步来到教室门口。我追了过来,直截了当地介绍道:“黄媛刚走半小时左右,你进去看看,书包都在教室里,一样东西都没拿,说了一会儿回来的。”

“不可能回来了。”黄媛母亲眼里透出惊悸和悲戚的神色。

“她父亲答应我买了东西就回来。”

我尽量复原刚才黄媛父亲、姐姐诚恳的话语以及承诺。这一切,似乎是安慰她也是安慰我。

“他是这样说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一直打电话都没人接,我再出去找找。”

“找到就立即打电话给我。”

我怎么那么傻呢?当时黄媛的姐姐主动说留电话号码给我,我以为只是一会儿,就觉得没必要。

看着黄媛的母亲慌乱的眼神,慌乱的脚步,我的心也慌乱而茫然。我不知

道这一刻该怎么办,下一刻又该怎么办。我只有等待侥幸,等待希望,也等待黄媛的父亲和姐姐兑现对我的承诺。

黄媛的母亲离开学校后,我一直心神不定,焦躁不安,又一遍遍地祈祷她母亲能找到她,也祈祷她的姐姐和父亲兑现承诺,送她回校。快到中午时,黄媛母亲说:“老师,不找了,没用了,人已经带走了。”语气里透出悲咽,透出绝望。

我一下哑然,瞬间就说不出口了,汗水在额头上冒汗,内心诚惶诚恐,怕她怪罪我。如果她怪罪和追责于我,那我该怎么办?又将何去何从?

紧接着,黄媛的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老师,不关你的事,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听到这话,我的心才踏实下来,不,是悬吊在脑门上两个多小时的心终于平安落下来。家长不会追责我,这是庆幸还是悲凉?

仅仅相隔几秒,我又开始愧疚和自责。我虽然逃避了名义上的责任,但道义上和良心上却受到了莫大的拷问和谴责。

中午12时,我在门卫处得到黄媛的父亲和姐姐留下的一个电话号码。电话打通了,没人接。我迫不及待地打第二遍第三遍,还是无人接听。

黄媛就这么音讯全无。

第二天,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我不死心,一直都在打黄媛的父亲和姐姐留下的唯一可以追寻的电话号码——安徽宣城手机号码。可对对方不是在通话中,就是被告知不在服务区。

关于这事,黄媛的母亲没有追究我,学校也就没有追究我。虽然没有一个人追究或者是追责我,可是我内心难以平静,我在追究自己,我把良心端出来摊放在道德的天平称。

我有愧于心。

为什么要在上学期期间放走学生?这是我最大的失责、最大的错误。我不敢把这个错误继续用力深挖,我内心满满的颤抖和深深的愧疚。我想,要是我的学生黄媛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我将如何面对?她生活在水富和生活在安

徽宣城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人生,如果黄媛生活得不好,那我该如何面对道义和良心!

这是我教书20多年来犯下的最大错。从教20多年来,有学生逃学,我去山坡上、林子里追过、找过;有学生放学不回家,我半夜与家长四处找过。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很多,可是没有这件事让我这么自责、愧疚和疼痛。

我和黄媛同学虽有仅仅不到3个星期的相处,可毕竟我们被师生情分细细地、轻轻地连接着。黄媛如一滴春雨湿润了我胸口,倏地一下又不见了。但肯定的是,有那么一滴春雨来过,有那么一滴春雨留下过痕迹。

这几天,黄媛同学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眼前,白嫩嫩的脸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,额头上的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,一指来宽附着桃红色蝴蝶结的水晶发条绑着向后梳着的头发,很美。她刚刚转学来的时候,担心她听不懂我上课的时候,又担心她不清楚我的作业要求方式。因此,在她紧挨着讲台坐时,我时时指导她,辅导她,关注她。

至今,黄媛的书包还放在我的一张简易的桌子上。一个淡蓝色的书包,里面装着满满的、本子和一个布袋文具盒。

黄媛临走的时候没有料想到自己会一去不回。因此,在她走出教室的那一刻,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,她眼神中略带歉意,大约觉得耽误了上课。她没有回头一瞥她的老师,她的同学,她短暂就读的校园。

我没有料到她会一去不返,因此我与她也就没有师生之间正式的道别,也就没有李白《赠汪伦》的那般真挚与深厚的话别;也没有王维《山中送别》的那般期盼与等待的送别;也没有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的那般惆怅与依依惜别;也缺少了我对她应有的叮嘱和祝福。她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愧疚。

(文中学生为化名)

# 嗜药的伤疤

范庆奇

家的经济条件,决定回家慢慢休养。出院的那天,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,浩浩加了我的微信,此后再也没有见过。

汽车总站离医院很近,走路10分钟。浩浩家在县上,我帮忙提着一包东西,里面装着浩浩吃的药和医院的各种检查单。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我开导浩浩把书读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浩浩点头说好,眼睛却没有看我。

公交车走了,浩浩也走了,在热闹的广场上我反而有种失落感,毕竟在一起待了那么多天,多少有点感情。

我喜欢写现代诗,自己也有一个公众号,偶尔会在公众号更新作品。浩浩从来不给我点赞,但是他会看遍我所有的作品,看完还会找我探讨。

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断断续续地微信聊天。后来,我忙着找工作,找到工作后忙着上班,和浩浩的联系就少了。我电话联系了实习医院的护士,从护士那里我知道浩浩出院后去找过那个女孩,不料却看见女孩和别的男生在一起。回家后,浩浩精神又出问题了,去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效果,也不知道最后治疗得怎么样。

挂掉电话我给浩浩发信息,聊天页面出现了红色的感叹号,提示我还不是他的好友。彼此都淡忘了。我点进他的头像,微信朋友圈背景是一张漫画,2个穿着古风的人正在拜堂。

浩浩才刚满20岁,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不是美好的,是生命中一次彻骨的疼痛,而恋爱后的伤疤像是嗜血一般,让他一次次步入记忆的循环。我希望浩浩彻底痊愈,希望浩浩把我删除了是想告别曾经的记忆。除此之外,别的可能性我不敢想。

下午我第一次见他爸爸。微胖的中年男人,进门就没怎么说话,他坐在病床的右边,右边靠近窗户。他低着头,翻看着手机朋友圈,浩浩也玩着手机,他妈妈背对着他们,这样的气闷怪怪的。

吃饭的时候,我们聊起浩浩爸爸,我才知道他爸爸明目张胆地背叛家庭,浩浩和他妈妈都知道。就像苦戏里演的一样,起初浩浩妈妈恳求浩浩爸爸回家,可任由浩浩妈妈怎么闹都没有用。浩浩爸爸现在不回家,每个月会给一笔钱。浩浩妈妈说,她不可能离婚,她就是耗着,浩浩爸爸耗完了她的青春,她也要耗着他。

我听着她说这些话,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,一个可怜的母亲。浩浩对他爸爸的态度很冷淡,没有恨,也没有爱。

浩浩吃着饭突然说,心里面很慌。我和浩浩妈妈知道这是要发病了,我在旁边鼓励他:“坚持一下,马上就回医院了。”一路上他痛苦得掉眼泪,不是因为外伤疼痛,而是心痛,没有伤口的心却在滴血。

我在路上就给护士打电话,让护士提前准备药,吃了药的浩浩慢慢冷静下来。他跟我说:“哥哥,我也不想这样,但我控制不住。”那一刻我心碎了,一把抱住他,让他放心治疗。我走下楼回出租屋的路上,看见公园里有科室的病人,3个孩子和2个老人,他们在锻炼,笑声很大,周围的人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。

那3个孩子是有智力缺陷的患者,他们的年龄和心智不成正比例增长,照顾他们的2个老人比他们还瘦小。他们的腰间永远拴有一根绳子,另一头则握在老人的手里。这2个老人不是他们的亲人,只是照顾了他们十几年的保姆,我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。

浩浩越来越好了,浩浩妈妈考虑到自

阴冷的房子,同时承担起救治的功能,生死在这里就是一瞬间。妇产科有新生儿降生,急诊科也有人离开尘世。

从聊天中得知浩浩妈妈在怀浩浩的时候已经33岁,好不容易有孩子,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从小想要什么就给什么,没有打过一顿、骂过一句。

我倾听着浩浩妈妈的诉说,时不时地和浩浩聊上几句,可能是同龄人的缘故,浩浩对我的抵触情绪很小,反而能聊起来。走的时候他还主动和我打招呼,我笑着回应他。后面再去浩浩病房的时候他就叫我哥哥,这小子情商挺高,很难让人不喜欢。

从浩浩妈妈的述说中,我知道浩浩被女朋友甩了。他假期直接去女孩家,一开始女孩父母好言相待,但浩浩不听劝阻,情急之下说了不尊重的话,被女孩父母赶出了家门。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,偏偏浩浩已经死心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丝光,正是这一点虚无的光把他害成现在这样。

某天,女朋友突然给浩浩发消息说可以考虑复合的事,这让浩浩很高兴。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,我见他在床上抱着手机笑,我取笑他是不是做梦娶媳妇了?他说,不做梦也娶媳妇。那几天浩浩的病情挺稳定,见谁都主动打招呼。

这样的好事来得太突然,去得也很突然。等我休息结束回医院,见到浩浩妈妈的时候,她说浩浩的病情更严重了,那个女孩子本来答应浩浩复合,可就在前天又说分手。看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,但对躺在精神科的浩浩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,他想不到,嘴里一直重复“为什么要分手,为什么要分手。”

经过几天的治疗,浩浩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,我时不时地和他聊天,就是那天

以前看农夫与蛇的故事,觉得农夫可笑,后来去医院上班,经历一些事后反而觉得农夫让人心怜,他的可悲也正是身边很多人的可悲。有些人不管被蛇咬过多少次,遇到蛇仍会去救。

我在医院精神科实习期间就遇到过一个人——浩浩。

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精神病患者是读大二的时候,云峰医院是收治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医院,且患者病情比较严重。医院里有一栋楼,四个保安守在大门那里。

隔着栏杆我看见那些穿着条纹衫的病人一排排地坐在花台上,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我,眼神空洞无物,没有一丝神采。他们不说一句话,我理解为他们安静少语,殊不知他们暴躁起来是有多么吓人。

我的带教老师是科室副主任,金丝框眼镜总是耷拉在鼻尖处,好像一低头就会滑下来,老师要求我必须跟着浩浩,不许迟到、早退。第一次见到浩浩时,他刚读大一,我以为他是来照顾某位长辈的孩子,一点也不像精神有问题的人。

我想了解关于浩浩的情况,查看了浩浩的病例,知道他是本地人,父母是国企工人,家里条件还不错,是个独生子。

高原的夏末,夜晚仍旧闷热难耐,我上夜班写病历。这时,走廊里传来护士的呼喊声,“37床发病了,李主任快来啊……”我听到声音就往病房跑去,只见几个护士把病人摁在床上,病人在挣扎,嘴里“呜呜”地吼着,房间里一时乱作一团。

进精神科才第一周就遇到了这种事,想到还得再待3个周,我倒吸一口凉气,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就算是晴天,医院的走廊也总是阴冷的,一到晚上,空荡荡的病房里,咳嗽一声都能听见回响。这收集人间苦难和泪水的